

中学生 人文阅读 新干线

语文大阅读

高中卷

5

- 《十八岁出门远行》…… 余 华
- 《人生之秋》…… 米·努埃曼 [黎巴嫩]
- 《囚绿记》…… 陆 蠡
- 《我的四个假想敌》…… 余光中
- 《草原长调》…… 韩少功

丛书主编：云 山 苏 澜

本册主编：肖 琼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高中卷5

中学生人文阅读新干线

丛书主编 云山 苏 澜



语文大阅读

YUWEN DÀ YUÉDU

本册主编 肖 琼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中学生人文阅读新干线
语文大阅读 高中卷 5
丛书主编:云 山 苏 澜
本册主编:肖 琼

责任编辑:龙鸿波 封面设计:方如意 版式设计:林 园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541004
网址:<http://www.bbtpress.com.cn>

玉林正泰彩印包装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开本:890×1 240 1/32 印张:7 字数:200 千字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 001~10 000 册

ISBN 7-5633-3945-0/G·2443

定价:9.00 元

序 言

ZHONGXUE YU-WEN DA YUEDU XUYAN

01

达尔文有一句话说得好：“最有价值的知识是关于方法的知识。”中国古人也说过，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些充满哲理的话，无不深刻地揭示了方法的重要。语文的学习自然要靠方法。仅仅指望课堂上的四五十分钟是学不好语文的。课堂上固然能学到一些阅读、写作等方面的“方法”，但要真正领悟、运用这些方法，除了课本之外，必定要借助一种或几种内容鲜活、选文精美、有个性、有特点，能教会学生掌握语文学方法的读物。

诚然，语文学习是方法的学习，但语文学习更是能力的学习。掌握方法的目的最终也是形成一种或几种能力，现今的中考、高考等语文水平测试也越来越注重对能力的考查。韩寒、《赤兔之死》等“异人”“奇文”能相继脱颖而出，也是因为其人、其文都表现出宽广深厚的语文能力。那么，语文能力如何形成呢？古人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遍观古今中外的文学巨匠、语言大师，哪一个不是通过广泛而深入的阅读而启迪智慧、发展能力？然而，在当前的教育体制下，广大中学生背

负着繁多功课的重荷，无暇进行披沙拣金的“拉网式”阅读。虽目不窥园，然心向往之。为了满足同学们对课外阅读和增强文学素养的渴求，同时又能帮助同学们节省宝贵的时间，我们为大家精心编写了这套丛书。

本丛书以中学语文新课标的要求为依据，并注意到不同年级学生的心理特点、知识水平及阅读趣味。鉴于语言、文学是传达情感、蘸吸真美的文明之花，且中学生朋友正处于身心发育、追求完善自我的如花年华，我们在编写本丛书时，力求给予青少年朋友思想的启迪、精神的完善、心智的丰富、认识力的增强，引导青少年朋友更好地关注人生、关注社会，更恰当地处理学习、生活、事业和做人的关系。由是，我们这一套书定位于“人文阅读”，以期实现“爱的教育”、美的陶冶。

为了充分实现以上目标，本丛书在编写、制作上都颇具匠心，精益求精。为容上，本丛书从选文和点评两方面下工夫。选文视野宽广，题材丰富，多为大家名作。点评鞭辟入里，精到全面，分旁评和总评两种。此外，各篇文章后还附有形式多样、内容与范文或课文关联的练习题目，以求实现读、讲、练三结合。形式上，本丛书插图精美、图文并茂、版式大方，相信也会得到同学们的喜欢。

本书投入使用后，若能真正使青少年朋友们提高语文水平，增强文学素养，丰富学习生活，增加人生经验，我们则不胜快慰。

编者

目录

ZHONGXUE YUWEN DA YUEDU MUBU

一、评论小辑

- 1 王蒙..... 我心目中的丁玲
16 吴中杰..... 鲁迅杂文评点
25 克罗齐..... 古代评论中的荷马

二、成长历程

- 31 余华..... 十八岁出门远行
41 【黎巴嫩】 米·努埃曼..... 人生之秋
47 【美国】 弗洛伊德·德尔..... 六岁那年的圣诞节

三、生存反思

- 53 苏童..... 河流的秘密
59 铁凝..... 惦念
66 陆蠡..... 囚绿记
71 余秋雨..... 关于友情
85 巴金..... 小狗包弟

四、小小说

迟到	刘国祥	91
丰碑	李本深	94
老秘的白字	牟丕志	98
规矩	陈茂生	102
地狱之门	〔马来西亚〕 彼岸	107

五、名人佳作

受戒	汪曾祺	111
我的四个假想敌	余光中	132
发嫂	唐人	140
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	冯骥才	158

六、漫游散记

撒哈拉的化妆术	〔马来西亚〕 戴小华	171
仰望布达拉	徐治平	179
天籁	周同宾	187
故乡的芦苇	樊发稼	193
山里的集	高耀山	198
草原长调	韩少功	206



我心目中的丁玲

✦ 王 蒙

这是一个危险的题目，因为丁玲是国内外如此声名赫赫如此重要的一位当代作家，因为她的一生是如此政治化，她面对过和至今(死后)仍须面对的问题是如此尖锐，因为她与文坛的那么多是是非非、恩恩怨怨纠缠在一起。还因为，在某些人看来，王与丁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反正怎么样写也不得好，弄不好又会踩响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地雷。再说，王与丁，分属两代人，她开始文学生涯的时候鄙人尚未出世。我对她的了解极其有限。承蒙她老的好意，1985年6月签名赠送给我六卷本精装

首先写自己为丁玲写纪念文章的危险性。由此我们也有点恍然大悟：王蒙给自己文章的题目定为《我心目中的丁玲》，从主观性的方面来写，避免了或多或少的问题的尖锐性或

可能招来的非议。

写丁玲的目的，颇有为丁玲翻案的意味。

老当益壮的丁玲本色。

《丁玲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版),我只是最近为写这篇文章才捧起它来阅读。这样,我写起来确实难免挂一漏万。郅书燕说,捕风捉影,以讹传讹,强作解人……总之,什么不是都会落到自己头上。

这个难题的挑战性恰恰吸引了我:纪念胡乔木的文章就是这样写出来的。我说,这篇文章没有办法写,但是《读书》的编辑说:“你行。”于是我就来了劲,冒起傻气来了。再说,在我的少年时代,我曾经那样地崇拜过丁玲。我读了一些谈到丁的文字,我又觉得与丁的实际有着距离。你不写,谁写?

一位论者说,那些 1957 年出过事的青年作家,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复出文坛以后,投靠了在文坛掌权的领导,而忘记了自己同命运而与领导是对立面的老阿姨(丁玲)。

可是我至今记得,在 1979 年丁玲刚刚从外地回到北京,我与邵燕祥、从维熙、邓友梅、刘真等人,在丁玲的老秘书、后来的《中国作家》副主编张凤珠同志引见下去看望她的情景。我们是流着热泪去看丁玲的,我们只觉得与丁玲之间有说不完的话。

但是事隔不太久传来丁玲在南方的一个讲话,她说:“北京这些中青年作家不得了啊,我还不服气呢,我还要和他们比一比呢。”

北京的中青年作家当时表现了旺盛的创作势头,叫做红火得很。当然作品是参差不齐的。大家听到了阿姨的话后,一个个挤眼缩脖,说:“您老不服,可是我们服呀。您老发表作品的时候我们这些人还不知道在谁的大腿肚子里转筋呀。我们再狂也不敢与您老人家比高低呀!”

后来几年,我又亲自听到丁玲的几次谈当时文学创作情况的发言。一次她说:“都说现在的青年作家起点高,我怎么看不出来?我看还没有我们那个时候起点高啊。”

另一次则是在党的工作部门召开的会上,丁玲说:“现在的

问题是党风很坏,文风很坏,学风很坏……”而在拿出她的《牛棚小品》时,她不屑地对编辑说:“给你们,时鲜货……”

在一些正式的文章与谈话里,丁玲也着重强调与解放思想相对应的另一面,如要批评社会的缺点,但要给人以希望;要反对特权,但不要反对老干部;要增强党性,去掉邪气,以及对青年作家不要捧杀,等等。(见《丁玲文集》以下简称《文集》一六卷 233、265 页)其实这也是惯常之论,只是与另一些前辈的侧重点不同,在当时具体语境下颇似逆耳之音。

于是传出来丁玲不支持伤痕文学的说法。在思想解放进程中,成为突破江青为代表的教条主义与文化专制主义的闯将的中青年作家,似是得不到丁玲的支持,乃至觉得丁玲当时站到丁“左”的方面。而另外的周扬等文艺界前辈、领导人,则似对这批作家作品采取了热情得多、友好得多的姿态。

这一类“分歧”本身包含的理论干货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与此后的若干文艺界的某一类分歧一样,大致上是各执一词,各强调一面;这也如我在一篇微型小说里描写过的,一个人强调吃饭,另一个人强调喝水,于是斗得不可开交。但是分歧背后有更复杂的或重要的内容,分歧又与政治上的某种大背景相关联,即与左右之类的问题以及人事的恩怨问题相关联,加上文学工作者的丰富的感情与想像力,再加上吃摩擦饭的人的执著加温……分歧便成了死结陷阱,你想摆脱也摆脱不开了。

一位比我大七八岁的名作家,一次私下对我说:“丁玲缺少一位高参。她与××的矛盾,大家本来是同情丁的。但是她犯了战略错误。50年代,那时候是愈‘左’愈吃得开,××批评她‘右’,她岂有不倒霉之理?现在80年代了,是谁‘左’谁不得人心,丁玲应该批判她的对立面‘左’,揭露××才是文艺界‘左’的根源,责备他思想解放得不够,处处限制大家,这样天下归心,而××就臭了。偏偏她老人家现在批起××的‘右’来,这样一来,××是愈批愈香,而她老人家愈证明自己不‘右’而是

这些“在当时具体语境下颇似逆耳之音”的言辞,一方面反映了丁玲对艺术的坚持和不趋炎附势的品质;另一方面也暗示了丁玲将要遭遇的恶果。

果真应验于现实,丁玲对艺术的坚持让自己树敌众多,于是谣言四起。

文坛上荒
谬的政治斗
争。

谣言(有
关“左”的谣
言)又纷纷四
起了。

列举诸多
事例,以说明
一个史实:丁
玲骨子里绝对
不是极“左”。

很“左”,就愈不得人心了。咱们最好给她讲一讲。”

令人哭笑不得。当然,一直没有谁去就任这个丁氏高参的角色。

而从丁玲的角度呢,她和她的战友好友们悲愤地表示:从前批她“右”,是为了害她,现在看出来批“右”是批不倒她了,又批上她的“左”了,真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说你左你就是“左”,说你右就是“右”呀!

丁玲的所谓“左”的事迹一个又一个地传来。在她的晚年,她不喜欢别人讲她的名著《莎菲女士的日记》《在医院中》《我在霞村的时候》;而反复自我宣传,她的描写劳动改造所在地北大荒的模范人物的特写《杜晚香》,才是她的最好作品。

丁玲到美国大讲她的北大荒经验是如何美好快乐,以致一些并无偏见的听众觉得矫情。

丁玲屡屡批评那些暴露“文化大革命”批判极“左”的作品。说过谁的作品反党是小学水平,谁的是中学,谁的是大学云云。类似的传言不少,难以一一查对。

那么丁玲是真的“左”了吗?

我认为不是。我至今难忘的是《人民文学》的一次编委会。那时全国短篇小说评奖,中国作协是委托《人民文学》杂志社操作的。在讨论具体作品以前,编委会先务一务虚。一位老大姐作家根据当时的形势,特别强调要严格要求作品的思想性。没等她的话说完,丁玲就接了过去,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什么思想性,当然是首先考虑艺术性,小说是艺术品,当然先要看艺术性……”

我吓了一跳。因为那儿有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管着,谁敢把艺术性的强调排在思想性的前头?

王蒙不敢,丁玲敢。丁玲把这个意思最终还是正式发表出来了。(见《文集》六卷447页)

丁玲有一次给青年作家学员讲话,也是出语惊人。她说:



“什么思想解放？我们那个时候，谁和谁相好，搬到一起住就是，哪里像现在这样麻烦！”

她又说：“谁说我们没有创造性？每一次政治运动，整起人来，从来没有重样过！”

如此这般，不再列举，以免有副作用。我坚信，丁玲骨子里绝对不是极“左”。

那么，怎么理解丁玲的某些说法和做法呢？

第一，丁与其他文艺界的领导不同，她有强烈的创作意识、名作家意识、大作家意识。或者说得再露骨一些，她有一种明星意识、竞争意识。因此，对于活跃于文坛的中青年作家，她与其说是把他们看做需要扶植、需要提携、需要关怀，直至青出于蓝完全可能超过自己的新生代，不如说是潜意识里看做竞争的对手，大面上则宁愿看做需要自己传帮带、需要老作家为之指路纠偏的不知天高地厚、不成熟而又被她的对手吹捧起来的头重脚轻、嘴尖皮厚的一群。她是经过严酷的战战争考验和思想改造的锻炼的。在党的领导人面前，她深知自己活到老改造到老谦虚到老的重要性必要性；但在中青年作家面前，她又深深地傲视那些没受过这些考验锻炼的后生小子。她自信比这些后生小子高明十倍苦难十倍深刻十倍伟大十倍至少是五倍。她最最不能正视的残酷事实是，出尽风头也受尽屈辱、茹苦含辛、销声匿迹 20 余年后，复出文坛，面她已不处于舞台中心，已不处于聚光灯的交叉照射之下。她与一些艺术大星大角儿一样，很在乎谁挂头牌。过去她让领导添堵也是由于这个，她从苏联开会回来就散布，在苏联爱伦堡几次请她讲话，并说：“你是大作家，你应该讲话。”但她不是代表团团长。代表团团长是与她不睦的××。她引用爱伦堡的话说：那个××团长“长着一副作报告的脸”，等等。请想想，这样的话传出去，她能不招领导讨厌吗？

（她说的并非完全不是事实，但中国国情与苏联不同，我们

对“丁玲的某些说法和做法”追溯原因，以对此作出合理的解释，从而树立丁玲的正面形象，让四起的谣言不攻自破。

调侃语气，调侃王蒙自己。

这里认的是谁是什么什么长，而不是谁是大作家。愈是大作家大什么家愈要把你摆平，这也是一种自由平等，也许是乐感文化。)

那么，她看到那时的所谓中青年作家左一篇作品右一篇作品得奖，以及各种风头正健的表演——其中自然有假冒伪劣——她能不上火么？恨乌及屋，她无法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文学潮流抱亲和的态度。当然，她也想立一些人，如写《灵与肉》的张贤亮，她为之不只一次地谈话和著文，但她已无法成事，她的支持中青年的动作的影响已经无法与××相比。还不如少支持一点打起另一面旗子。她的可爱其实也在这里。在这上头，她恰恰表示的是她是普通一兵，是骡子是马咱们拉出来。咱们比的不是年龄，不是资历，不是级别而是实打实的写作。她喜欢的位置在赛场上，而不是主席台上。她争的是金牌而不是满足于给金牌得主发奖或进行勉励作总结发言。见到年轻人火的不行而并无真正的得以压得住她的货色，她就是不服，她就是要评头品足，指手画脚，乃至居高临下，杀杀你的威风。这样的伟大作家前辈并不只她一个，而且，说老实话，如果不及及时反省调整，王某人也会变成或已开始变成这样的角色。

其次是由于她的特殊政治经验特别是文坛内斗的经验。她长期以来一直处境严峻。她回到北京较晚，等到她回来的时候，伤痕文学已经如火如荼地火起来了。她那时虽然获得了平反，却也一度仍留着尾巴。而她认定应该对她的命运负责的××正在为新时期的文学事业鸣锣开道，思想解放的大旗已经落到了人家手里，人家已经成了气候，并受到许多中青年作家和整个知识界的拥戴，却也受到某些领导人与老同志的非议。她怎么办？她自然无法紧跟××，她要与之抗衡就必须高擎相对应的类似“反右”的旗帜。她在党内生活多年，深知自己的命运与领导对自己的看法紧密相关，这决定于是你还是你的对手更能得到党的信赖。要获得这种信赖就必须顶住一切压力阻力

人情面子坚持反“右”，这是政治上取胜的不二法门——那位老作家的高参论其实没有丁玲高。她必须像爱护自己的眼珠一样地爱护自己的政治可靠性忠诚性政治信用性，亦即她的一个老革命老共产党员的政治声誉。她明确地下定义说：“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见《文集》六卷230页）这来自她的血泪经验，也来自她的政治信念价值系统，当然有她的道理。燕雀安知鸿鹄之志鸿鹄之道？在鸿鹄们看来，根本用不着与那些书呆子燕雀雏儿讨论这种问题。

她的对手过去一再论证的就是她并非真革命真光荣真共产主义者，这有莎菲女士为证，有她的某些“历史问题”为证，有她的犯自由主义的言谈话语为证。这是对她的最惨重的打击。有了这一条她就全完了，再写一百部得斯大林奖的小说也不灵了。而她的生死存亡的决定因素是她必须证明她才是真革命的：这有《杜晚香》为证，有她的复出后的一系列维护党的权威歌颂党的领导以及领导人的言论为证。“一生真伪有谁知？”这才是她的最大的情意结。当差不多是她取得了最后胜利的时候，当她的对手××被证明是犯了鼓吹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异化论的错误，从而使党的信赖易手的时候，她该是多么快乐呀。

这样我就特别能理解她在“文化大革命”后初复出时为什么对于沈从文对她的描写那样反感。沈老对她的描写只能证明她的对手对她的定性是真实的——她不是革命者、马克思主义者，而只是一个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她必须痛击这种客观上为她的对手提供炮弹、客观上已经使她倒了半辈子霉的对于她的理解认识勾勒。打的是沈从文，盯着的是一直到政治上贬低她的××。你说她惹不起锅惹箴箴也行，灭不了锅就先灭箴箴，灭了箴箴就离灭锅更靠近了一步。这是政治斗争也是军事斗争的常识性法则，理所当然。她无法直接写文章批××。对××，她并不处于优势，她只能依靠党。与××斗，那靠的不是文章而是另一套党内斗争的策略和功夫包括等待机会，

“一生真伪有谁知”一句话，写得有些辛酸，却概括了丁玲多次多难的一生，永远生活在是非非中的一生。王蒙对丁玲的一生是持肯定态度的，对她的坚持艺术、坚持真理是持肯定态度的。肯定的背面是肯定。他肯定了丁玲，它的背面就是否定与丁玲作对的一切，批判力量和否定对象不言而喻。

理解丁玲“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做法和意图。

指出革命标准的不合理，而当人再拿这样不合理的“革命”标准去衡量丁玲，特别是固定地去衡量革命前的丁玲，这样的“定论”又具有什么样的说服力呢？于是，王蒙发出这样愤怒的控诉：“把这样的作家打成右派，真是昏了心！”丁玲死后家属的要求遭拒绝，更让王蒙痛上加痛，愤怒至极！

当然更靠她的思想改造的努力与恪忠恪诚极忠极诚的表现。对于沈从文，她则处于优势。她战则必胜，她毫不手软，毫不客气。她没有把沈放在眼里，打在沈身上就是打在害得她几十年滴入冷宫的罪魁祸首身上。

我还要论述，这里不仅有利害的考虑而且有真诚的信仰。革命许诺的东西太多太多了，要求的东西也太多太多了。一个人接受了革命，就等于换了另一个人——如毛泽东赠丁玲词所言：昨日文小姐（请注意，是小姐，这个称谓并不革命），今日武将军。过去种种比如昨日死，今后种种比如今日生。他或她时刻准备着为革命洒尽最后一滴血，为革命甘当老黄牛，忍辱负重，万死不辞。她在1942年6月即延安文艺座谈会刚刚开完时，触目惊心地质证道：“改造，首先是缴纳一切武装的问题。既然是一个投降者，从那一个阶级投降到这一个阶级来，就必须信任、看重新的阶级……即使有等身的著作，也要视为无物，要拔去这些自尊心自傲心……不要要求别人看重你了解你……”（《文集》六卷21页）没有对于革命或用丁的话即对于新的阶级的真情实感，是写不出这样的刺刀见红的句子的。这样激烈的言辞透露了她在文艺座谈会上受到的震动，也透露了某种心虚。把这样的作家打成右派，真是昏了心！无怪乎直到丁死后，其家属一直悲愤地与治丧人员谈判，要求将鲜红的镰刀斧头党旗覆盖在她的遗体上。而治丧负责人以按上级明文规定她的级别不够为由，并没有满足这一愿望。呜呼，痛哉！

而与此同时，一朝革命，便视天下生灵为等待拯救渴望指引嗷嗷待哺的黑暗中摸索的瞎子（这种心态表现的最充分的就是话剧《杜鹃山》。此话剧是教育雷刚们的，表达的却是柯湘们的自信）。一朝革命便视那些不大革命的人为糊涂，为落后，为盲瞽，为混账，为历史大波上浮沉的泡沫，最好也不过是一看二帮我说你服的对象。至于反对革命的人，那就只能是敌人了。对敌人仁慈就是对人民残忍。同时一旦革命也就视自己的革

命者的身份为高于一切的宝贵。为了这个最宝贵的身份和名誉,人们不能害怕斗争,不能做好好先生。小不忍则乱大谋,人们可以或必须“缴纳”一切的一切。当下的小字辈可以不理解这些,却无法否认这种信念这种追求的真实性与历史必然性。

革命的崇高伟大与艰难牺牲决定了它的奋不顾身一往无前的决绝。丁玲自然不能讲情面。她认为她有权利也有义务反击不知革命为何物的沈从文对于她的歪曲——至少是对于她的未革命时的某一侧面的不合时宜的强调。为了革命的正义性,她可以毫不犹豫地念与沈的旧谊。北京一解放,沈去看望丁,丁对他并不热情,联系一下当时的语境,我们就无法以不革命的庸人的观点去评说这件事。当时一个是老革命,是胜利者接管者掌权者,一个是老不革命。最好也不过是刚刚得到解放,刚刚开了革命之窍,肯定对革命还有许多糊涂思想的老知识分子,说不定还有若干需要审查的历史疑点,丁怎么可能以老朋友的态度对待沈呢?以革命家的身份衡量丁玲,丁玲未必是那么不近人情,她近的是更高的阶级情政治情原则情。丁玲为革命确实付出了不少东西。那么再把老友沈从文搁置一下,让分管沈的部门去处理,有何不可?沈和丁的恩怨沧桑更多的是历史造成的,我们当然不能责备沈老,同样也无法以一般人情世故的观点去责备丁玲。如果没有一点狂热和自豪,又哪儿来的知识分子的革命化?而中国知识分子的革命化,正是中国革命迅速取得胜利的一个因素,是中国革命的一个特点或者优点。当然,如果丁玲还活着,那么待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过去以后,在尘埃落定以后,也许我们愿意与她老人家共同假设一下:如果当初,她老人家不那么严厉,如果她当初也能尊重与自己的政治选择人生选择不同的知识分子,如果她能够多一点人情味,多一点平常心,多一点对芸芸众生的善意,有何不好,岂不更好?换句话说,一个革命者在取胜以后,在普天之下莫非革命之土以后,盛气凌人地炫耀自己的革命与傲视别人的

社会潮流亦是如此,我们又怎能去责怪丁玲呢?我们又为何不能理解丁玲对沈老的不讲情面呢?

批判荒谬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年代的思想残余。年代变了,主导思想也应该变化。就如同如何看待丁玲的问题,都是我们应该三思的问题。

作者客观性地评价丁玲，既能正视丁玲的优点，也能正视丁玲的缺点：比如表现毫无政治风度；比如只求泄愤，不顾后果。

不革命，究竟是有利于执政巩固革命成果还是相反呢？这也值得确实革过命的杰出人士们三思。

年轻得多的人无法理解丁玲的那种政治激情，有时把投身革命与什么仕途进退搅在一起，这会让革过命的人气得发疯。反过来说，如果认为一个人既然参加了崇高伟大的革命就超凡脱俗，从不考虑“仕途”（当然是别的词儿，如叫做进步或者信任或者关怀、考验），大概又太天真烂漫了。

那么，丁玲是一个政治家了？可惜不大是。丁玲是一个艺术气质很浓厚的人，她炽热，敏感，好强，争胜，自信，情绪化，个性很强，针尖麦芒，意气用事，有时候相当刻薄。在1931年写作的未完稿的《莎菲女士的日记》（第二部）中，她的莎菲女士写道：“不过我这人终究不行，旧的感情残留得太多了，你看我多么可笑，昨天竟跑了一天下午，很想找到一点牡丹花……”（《文集》三卷312页）这是她的一个夫子自道。到了半个世纪后她的《牛棚小品》里，丁玲描写她与陈明同志的爱情，竟是那样饱满激越细腻温婉，直如少女一般，令人难以置信。但这是真正的艺术的青春。一个确实政治化了的人绝对写不出那样的小品——却也让极政治化的人觉得肉麻。有一次是中篇小说评奖大会后的合影留念，她来了，坐下了，忽然看到了身旁座位的名签：××，就是她最不喜欢的那个领导，她噢了一声像被蝎子螫了一下，立即站起身来。她的表现毫无政治风度。再比如她动不动打击一大片，只求泄愤，不顾后果，结果搞得腹背受敌。政治家决不会这样做。如她说什么作协创作研究室编辑的对于二十四个中青年作家的评论集是“二十四孝”，用这样恶毒的话来树敌，暴露了自己的心胸不够宽广，窃为丁玲不取。然而，这才是丁玲，她的个性，她的光辉，她的感情气质，常常也表现在这里。

她的过分自信也表现在她晚年办文学杂志的事情里。在新侨饭店举行的创刊招待会上，她是如何喜气洋洋通体舒泰